

Mary G. Mazur, *Wu Han, Historian: Son of China's Time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9. xiii+515pp.

陳耀煌*

Mary G. Mazur 是一位美國學者，1994 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本書乃根據其博士論文改編而成。作者投入吳晗研究長達二十餘年，僅從本書收錄的豐富資料，以及作者長時期在北京所作的口述訪談，即可看出其用力之深。如本書書名《歷史學家吳晗：時代下的中國兒子》所示，作者主要目的是欲突顯吳晗對中國自身的關懷及其作為歷史學者的一面。在此一預設理念主導下，全文論述雖然清楚，卻予人不少批判質疑的空間。

全書係在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激進與保守，以及考證與社會科學治史方法的二元對立架構下進行闡述，作者試圖證明本書主角吳晗並沒有偏向任何一方，而是在這些假想的二元對立價值觀裡，始終不渝地堅持中立的學術道路。作者一開始就指出，出生在一個沒落地主家庭的吳晗，既背叛了他那保守頑固的父親，對其身為長子所應肩負繼承家業與傳宗接代之傳統義務的期望，堅毅地離開偏僻的家鄉，到深受現代思潮影響的城市求學；也沒有像他的同學千家駒等人般，早熟地投入國民革命，乃至於激進共產革命的道路。相反地，吳晗只是一個熱中歷史的書呆子，既有叛逆的一面，又對政治、名利，乃至於女色皆毫無興趣。此一純樸而且高尚的性格，自始至終貫穿吳晗的一生。作者批判當代中國把吳晗描繪成反革命者或共產主義戰士的神話，卻又把他神化為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另一種超然客觀的理想知識分子。

自 1925 年起，迄抗戰止，吳晗先後在胡適、蔣廷黻的門下學習。在這裡，作者把胡適與蔣廷黻分別當成中國傳統考證史學與西方社會科學綜合分析方法的代表。作者以為，吳晗能夠像胡適或顧頡剛等人般，擅用考證的方法批判質疑過去理所當然被接受的歷史，如其在 1930 年代編纂的《胡應麟年譜》，推翻了過去史家關於明代學者胡應麟死亡年代的推測。但吳晗又不僅止於考證，他早年關於西漢社會經濟的分析、明代胡惟庸黨案考，以及關於金瓶梅社會背景的考察等，在事實的考證之外，還試圖去分析這些歷史事件背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因素。確實，如作者所言，深受清末民初以來漸興的新史學的影響，吳晗的治史觀念，與過去中國正統歷史所偏重的菁英史觀大異其趣。然而，作者把胡適與蔣廷黻的治史方法二元對立化，這種論述恐怕大有疑問。蓋所謂的考證法與綜合分析的治史方法原來就密不可分，不同史家或許各有所偏重，但絕對沒有道理認為吳晗因為綜合了這兩種方法而較同時代的史家有任何過人之處。作者甚至將吳晗的史觀比擬為當代西方學者倡導的文化史，並宣稱文化史是「最純粹、最完美的歷史科學」。似此溢美之詞，未免過度。

作者意圖藉由吳晗與胡適的比較，抬高吳晗的形象。作者雖然指出吳晗師承胡適，但後者卻被她形容成一個崇尚西方思想，卻又拘泥於史料考證，且政治態度保守頑固的學者。書中引用胡適對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一書的看法為例，說羅爾綱與吳晗這一批年輕的學者，其治史目的就是要把歷史事件放到其相應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但頑固的胡適並不諒解，竟主張研究中國歷史不用管中國文化，只要了解西方思想即可；他批評羅只看到片面的歷史，沒有全局的觀點，還批評羅的著作是為革命宣傳。作者據此指摘胡適就像傳統中國史家一樣，以為歷史應為統治者服務。她還諷刺胡適氣量狹小，打壓其學生羅爾綱，不准他離開北大門下，到他處就更高薪的職務（頁 214-215）。作者關於此事的描述是引自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但對照原文，羅爾綱並無批判其師之意。至於所謂只要了解西方思想，不用管中國文化，或為革命宣傳等

語，根本也不是胡適所言。羅爾綱更沒有如作者所形容般，嘲諷其師胡適的考證方法。作者斷章取義，乃至曲解史料以抬高本書主角吳晗的作法，並不妥當。

作者說，胡適的保守頑固與氣量狹小，突顯了吳晗的客觀公正與平易近人。她說吳晗是一個有真材實料，對學生熱情關懷，值得學生尊敬的老師，不像胡適這種老學者一樣，以理所當然的態度受他人尊敬。作者還說，胡適之所以反對傳統婚姻，是因為崇尚西方思想，而吳晗與袁震的結合既傳統又現代，是心靈上真正的契合（頁 244）。這些說法，根本只是作者為了推崇吳晗所作的毫無根據之主觀臆測。作者還進一步批評，胡適在抗戰中期以來愈益保守，支持頑固的國民黨政權。在新四軍事件時，作者說胡適對美國人說中國沒有共產黨軍隊，因此終於與愈益進步的吳晗在政治上分道揚鑣（頁 259）。當時中國確實沒有「名義上」的共軍，而且作者這裡引用的是史諾(Edgar Snow)於 1958 年出版的《我在舊中國十三年》(*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一書的說法，當然偏袒中共。作者接著痛斥國民黨當局日益貪污腐敗，引用聞一多弟弟聞家駟的口述，說蔣介石在抗戰結束前就已命令要「處理」進步分子吳晗與聞一多（頁 287），但此一說法事實上也有待商榷。她甚至錯誤地引用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著作，指稱胡適也懷疑沈崇不是一個有教養的中國女孩（頁 323），但 Pepper 原書係說胡適態度較溫和，主張沈崇案是法院的事，不應變成反美遊行和罷課的事由。作者一再錯誤地引用、誤解史料，不公正地詆毀國民黨當局與胡適，藉此來抬高吳晗，此一作法人扼腕。

吳晗在 1962 年與《北京日報》記者談話時，宣稱他是胡適的學生，曾上過陳寅恪的課，但胡與陳沒有教給他什麼。此一自述原來就大有問題，本書一開始也已證明胡適的治史方法對吳晗的影響，但作者後來竟然也宣稱吳晗係一位自學而成的學者，而且不是考證學者。作者不僅意圖撇清吳晗與胡適及考證法的關係，還指稱吳晗也沒有盲從馬克思主義等社會科學分析法，更沒有像陶孟和等人一樣，投入到中國歷史分期的意識形態之爭。究其實，作者要說的是，吳晗在中國傳統的考證法與西方的社會科學間走出了一條中立道路。此一中立

立場也反映在吳晗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上。作者說，吳晗瞧不起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是滿嘴馬克思主義、西化極深的自負學者，也反對國民黨當局提倡的「大漢族主義」歷史，因為作者認為吳晗是一位杜威式的實用主義者，說他研究歷史是爲了要解決現代中國的困境，即所謂的古爲今用。

平心而論，吳晗的治史法確實與胡適的考證學，以及標榜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不盡相同。但是，作者這裡把考證學與馬克思主義當成「大漢族主義」與西方化兩種極端，由此得出吳晗是中立客觀「實用主義」者的說法，非常彀扭。蓋所謂的「大漢族主義」是中共用來抹黑國民黨的片面之詞，作者如此不加批判地用此術語，實在可議。至於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原是無可厚非，但本書的論述卻讓讀者感覺作者爲了維持吳晗中立客觀的形象，想方設法切斷吳晗與馬克思主義的聯繫，畫蛇添足，反而使人感到牽強。如作者辯稱吳晗抗戰前的學術著作已表達對農民群眾的同情，也贊成土地分配的重要性，但她又說吳晗關於此點的看法，符合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相反（頁206）。然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又何嘗反對孫中山此一口號呢？再如作者說，抗戰時吳晗和張蔭麟試圖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寫大眾化的中國通史，但又辯稱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頂多也只算是一個溫和的唯物主義者（頁250、258），這些含糊不清的解釋不是太勉強了嗎？

事實上，象牙塔裡的歷史家與外在的現實政治原來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作者也相當清楚，即使吳晗自己也表明他在1940年以後越來越關懷政治，以致念書時間變少。吳晗畢生曾先後多次大幅修改他的《朱元璋傳》，從一開始就表達了深切的政治關懷，如Mazur所指出，該傳於1944年初版時，吳晗因應當時中國局勢，強化朱元璋作爲一位民族解放英雄的形象；1948年的修正稿中爲批判蔣介石，又突顯朱元璋威權陰暗的一面。後來因爲毛澤東的意見，希望吳晗能多稱讚朱元璋作爲農民革命領導者好的一面，不要寫得那麼壞，結果在1954年與1965年的版本又先後大幅修改，主張朱元璋「功大於過」。儘管最後吳晗的朱元璋傳記還是不能盡如毛澤東之意，但此一過程已足以證

明，外在的現實政治對歷史家的創作有著深刻而難以忽視的影響，吳晗絕不是一位關在象牙塔裡的歷史學家。關於《朱元璋傳》幾個版本間的差異，以及吳晗治史趨向與現實政治的關聯，潘光哲教授曾撰文〈學習成爲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晗的個案研究〉(1997)，詳細比較與討論，讀者當可從中獲益良多。

Mazur 即使知道這些歷史事實，還是要辯稱吳晗的政治傾向與參與，不僅未違背其學術立場，還與其人道主義的個性與正義感有關。例如，她指稱吳晗、聞一多與張東蓀因爲從中國歷史的經驗得知中國需要一個好的統治者，而知識分子的認可則是中國統治者合法性的來源，所以才支持由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並贊成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至於與吳晗等人作對的民盟右派羅隆基、潘光旦等人，則是西方化太深，以致用西方民主的標準，反對共產黨的領導（頁 294-295）。確實，中國共產革命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性格，但以中國化或西方化作爲判定親共或反共與否的標準，簡直荒誕不經。況且，作者又憑什麼恣意斷定同樣留學過西方的聞一多、張東蓀與張蔭麟等人，要比羅隆基、潘光旦等更中國化呢？共產黨固然積極尋求知識分子的支持，但他們自認的統治合法性，恐怕主要是建立在工農群眾之上，而不是像過去封建王朝的統治者般，依賴知識分子的認可。作者關於中共與知識分子間關係的看法，到底是反映了傳主吳晗，還是本書作者的天真呢？

1948 年，吳晗在石家莊與毛澤東第一次會面，毛抽空讀了吳的《朱元璋傳》，提出意見，並勉勵吳晗若能多學點馬克思唯物主義，未來將不可限量。吳晗大爲感動，從此鑽研馬列主義，熟讀毛主席的著作，衷心高呼共產黨、毛澤東萬歲。到底吳晗這些學者爲什麼會在這一時期發生如此大的轉變，甘爲共產黨喉舌？這與他們知識分子的身分有無矛盾？他們是不是被迫與不甘心地曲意逢迎呢？不同學者有不一樣的看法。田漢和吳晗後來同樣因爲歷史劇而在文革時期被迫害至死，今天中國大陸出版的《田漢傳》裡，就把 1949 年後的田漢描繪成一位處於「官」與「我」矛盾衝突的知識分子。這種二分法雖然簡潔明瞭，但它必須有一個不變的知識分子的獨立自我作爲前提，值得商榷。

Mazur 則是從另一角度抬高此一理想的知識分子形像，辯稱吳晗即使向共產黨一邊倒，接受北京市副市長一職，並主動積極響應中共的自我批評思想改造，卻沒有違背其初衷，因為他自認為統治者服務係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所以，吳晗即使當了「官」，仍舊維持其過去的「我」，在這裡，「官」與「我」的吳晗沒有衝突。因此，即使如本書所舉之例，吳晗夫婦在當了中共高官後開始擺起架子，冷落、瞧不起過去學術界的朋友；在反右運動中，大張旗鼓批判其過去民盟的朋友與親戚；在大躍進全國餓殍載道之際，仍過著衣食無虞的優渥生活，並高呼大躍進萬歲，但作者仍舊堅稱，吳晗打從心裡還是一位歷史學者。

到底吳晗等知識分子在中共的統治下有沒有改變其原來的自我呢？王蒙在 1980 年創作的短篇小說《蝴蝶》，很有啟發性。小說主角張思遠是一個打從心裡信仰共產黨的進城幹部，他為革命犧牲奉獻，也像吳晗一樣在反右運動時痛批其親人墮落。但文革以後，他被打倒下放，離開官場的張思遠在偏遠落後的農村裡似乎找回了他的自我，愉快地過著田園生活。然而，在文革尾聲，張思遠被平反復職，回到了城市官場，他又變成像進城之初那樣熱中為國家服務的高幹了。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張思遠呢？同樣地，1949 年前後的吳晗哪一個才是真的吳晗呢？就像莊周夢蝶一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這個問題恐怕永遠無解，唯一值得警惕的是，我們不要根據當代的後見之明，預設一個理想的知識分子標準，去評價中共統治下的知識分子。

1960 年前後，吳晗創作了後來讓他名垂千古的《海瑞罷官》一劇。作為一位歷史專家與業餘戲劇家，《海瑞罷官》與同時代戲劇家的作品比較，實在不能說有什麼過人之處，而且吳晗寫海瑞原來就是為了宣揚毛澤東的思想。當 1959 年廬山會議以前，毛澤東對當時下層幹部推動大躍進政策時隱瞞實情的作風不滿，所以鼓勵大家要敢說真話，批判這些幹部，還當眾稱讚明代敢說敢言的清官海瑞；包括吳晗在內的一些學者就寫了許多與海瑞相關的文章，其中吳晗的作品在 1960 年被改編成戲劇。其他像田漢的《關漢卿》等歷史劇也都

同樣是爲了呼應毛澤東的講話，它們轟動而成功的演出，與國家的宣傳動員也密切相關。但吳晗、田漢等人卻像被灌了迷魂湯一樣，開始志得意滿，吳晗甚至扮起專業歷史劇的專家，越俎代庖地批判其他歷史劇。但他們並不清楚自 1959 年廬山會議彭德懷事件以來，特別是 1960 年代初劉少奇等中央領導有意緩和集體化的步伐後，毛澤東對這些以古諷今的歷史劇日漸不滿，儘管此一歷史劇風潮一開始是毛掀起的。本書作者與當代大陸官方作家一致認爲，毛之所以在幕後推動批判吳晗與《海瑞罷官》一戲，就是以爲吳晗藉此戲諷刺其罷免彭德懷一事。但 Mazur 在此卻節外生枝地說，當時吳晗因爲愈益強調中國傳統文化道德，以致與日益偏向西方化的毛澤東產生矛盾。此一說法，又是作者用她自己預想的中國與西方的二元對立價值觀去評價吳晗與毛澤東，讓人丈二金剛，完全沒有頭緒。

作者在書中曾提到，胡適倡導撰寫傳記時，史家應如實記載，不要爲了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刻意污衊或漂白傳主。但我們也清楚，歷史學家在實際創作時並不容易做到這一點，這原是無可厚非。可是作者引此話的原意卻是欲稱頌吳晗的朱元璋傳記做到了此一點，而她明明也清楚吳晗的《朱元璋傳》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如何能夠下此斷言，令人匪夷所思。再者，本書作者是否也在某些地方爲了抬高吳晗的地位與突顯本書的主旨，而不經意地違背了胡適所提倡如實記載的精神呢？這一點也值得吾人再商榷。